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 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分析与培育路径

何 博

(云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1)

[摘 要]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研究要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网络中的在场及两者的互动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需求的契合问题、认同博弈与“归属于谁”的现实困惑问题等。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认同建设, 就“被给予”因素的培育而言,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场的社会氛围的营造, 加强中国近现代史教育; 就“选择”因素的培育而言, 要继续加大对西南边疆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 继续加大对西南边疆民生事业的投入力度, 不断加大对马克思主义与西南边疆社会利益获得关联性的解读和宣传力度。

[关键词] 西南边疆 少数民族 马克思主义认同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7)09-0046-05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17.09.007

人类社会的整体性面临着来自两个维度的解构: 一是横向维度的文化和价值的“差异”, 其将人类社会分割成为不同的民族和族群; 另一个是纵向维度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距”, 其将人类社会分裂成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多民族国家面临民族统合的普遍难题, 进行国家层面的共同文化建构成为公认的出路之一。今天, 在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内部, 在社会层化分离不断加剧、信仰博弈日趋激化的背景下, 选择研究特殊群体——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大众的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 不仅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精细化, 也有助于边疆社会心理研究走向深入, 还可以为边疆社会治理提供新的视角。

一、认同的本质与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内涵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 认同概念的勃兴和流行,

反映的是认同困惑的现实迷惘和困境。社会生活中的主体, 需要自我与心灵的交融、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以及对于自我意义的追寻。在心灵、他者和意义共同编织的网络中, 主体需要寻找自我和自我意义, 需要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 需要将自我归属于一定的身份和意义之中。

弗洛伊德最早提出并首先在学术领域使用认同概念, 他最初将儿童把父母或者老师的某些品质吸收为自我人格的一部分的行为定义为认同, 并认为所谓认同, 就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者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1]在这里, 认同的意义就在于满足主体对于归属感的需求。主体是需要自我与心灵、自我与他者以及自我与意义世界的互动中来编织社会生活的, 在乔治·H·米德看来, 这种互动才是主体自我意识的真正基础。他认为, 具有自我心灵的主体, 不仅可以作为自我而存在, 也可以作为自我的对象而存在, 从而就出现了作为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大众‘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及其典型案例研究”(项目批准号: 12CKS025)。

主体的自我“I”和作为客体的自我“me”的分野。这一理论最后便发展成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理论渊源。^[2]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弗洛伊德和米德的基础上对认同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解读,他认为所谓认同其实质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或明确或隐晦的回答,是基于基本的同一感和延续感,事关基本的忠诚和忠实,以及有关幸福、自尊、自信,根深蒂固的、强烈的、下意识的感觉。^[3]社会学家涂尔干从社会群体的共同意识的维度去阐释认同,他认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综合,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者共同意识。”^[4]

视角各存差异,重点亦有不同,但学者对于认同概念内涵的强调却形成了诸多共通之处。其一,认同客体与认同主体的互动是认同达成的前提基础。在认同主体的心灵、社会关系与意义世界共同编织的社会生活网络中,认同客体不能缺场,而且应该在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与认同主体之间进行着一定形式的互动,认同客体与认同主体之间的这种互动的存在,是认同产生的基础性前提。其二,认同客体对于认同主体需求的契合是认同达成的关键环节。也就是说,认同客体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认同主体的一定需求的满足。这种供给与需求的契合是认同产生的关键性节点。其三,认同主体对于认同客体归属感的生成是认同达成的根本标志。认同主体一旦形成了对认同客体的归属感,就会产生两种相辅相成的结果:一方面是主体归属于客体,主体获得客体给予的某种身份。认同越强烈,这种身份在自我身份意识体系中的序次就会越靠前。另一方面是客体归属于主体,此时的客体就不再是空泛的客体,而是主体的客体了。认同的其他所有涵义都是紧紧围绕归属感而展开的。

梳理认同研究的发展历程,厘清认同概念的本质内涵,结合意识形态认同的特殊性,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认同就是大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归属的认知、强烈的情感皈依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正向性行为。其间,马克思主义在大众社会生活中的在场及两者间的积极互动,是马克思主义认同产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的一定需求的契合,是

马克思主义认同形成的关键节点;自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归属感的生成,是马克思主义认同达成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定性判断下,由于认同强度的差异,马克思主义认同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主体对自我归属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归属性的认知。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认知并不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这种认知的直接指向是归属感本身,是指主体对于自身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确定。这种认知确立了主体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的赞同者、支持者的身份,并使这种身份觉醒且明确化。其二是主体对自我归属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归属性的情感皈依。社会生活中,不仅存在着“对”与“错”、“利”与“弊”的判断,同样存在着“我”与“他”、“我们的”和“他们的”的立场抉择。前者依赖理性,后者产生情感。主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归属性的情感态度不能是中立的、无所谓的,而应该是充满情感皈依的。其三是基于前两个层次基础,自觉践行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行为。一切心理状态只有付诸实际行动才能真正产生现实影响。意识决定身份,身份影响利益的内容与边界,利益影响行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既存在认同与不认同的性质判断问题,也存在着认同强度的考量问题。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真正炽热和升华,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践行和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自我核心利益进行维护和捍卫。

二、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认同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是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大众为认同主体,以马克思主义为认同客体的认同问题,逻辑地讲,此问题不仅包括影响认同达成的诸多问题,也包括认同达成后认同感的持久和强度提升问题。本文着重对认同达成过程中的诸问题及其成因进行探讨。

1. 马克思主义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网络中的在场及两者的互动问题

在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中,一定程度存在着“边疆”和“少数民族”的二位重合现象,所以就有

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普遍提法。而在西南边疆，为数众多的具有浓郁自我民族文化特性的少数民族共同构筑出一幅独特的民族和谐画卷。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民族和谐局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指导中国民族实际的直接产物。但我们也注意到，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大众的主观认识中，马克思主义却或多或少地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疏离。也就是说，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场问题。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与其日常生活疏离问题的成因中，马克思主义的书写方式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其内涵和本质是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语言方式和语言风格来完成书写和描绘的；书写方式和语言风格反过来又会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形象。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日常生活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依靠三种书写方式：政治性书写、教科书书写和学术性书写。^[5]其一，政治性书写及其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实践家不仅用语言文字也用实际行动来书写马克思主义。两代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成功书写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毛泽东用中国历史典故、民间故事和自我独特的语言风格，邓小平用朴实无华的日常的语言，共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平民化形象。这种生活化、生动而又亲昵的形象反过来又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当下在西南边疆社会的基层政治学习和宣传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充满官腔的、完成任务式的、形式主义的、“文件复读”式的现象，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伪政治性书写”^[6]不仅伤害着马克思主义的原有形象，也在疏远着其与大众的距离，由此也导致现实生活中大众会把对“形式主义”和“官腔”的消极态度扩散到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态度上来。其二，教科书书写及其问题。教科书书写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借助于抽象的概念和相互交叉的知识体系，勾画出的更多的是一个抽象的世界而非生活的世界。这个抽象的知识体系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好像是无所不在，又好像是很难被真正捕捉的。正是在这样的感

觉中，马克思主义被大众认为是与其日常生活疏离的。其三，学术性书写及其问题。学术性书写是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对象，用独特的学术话语来力图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本质的书写方式。在学术性书写方式里，不仅书写者必须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精通专业的话语体系，而且接受者也往往需要有专业的学术训练。学术性书写所勾画出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高深而晦涩的，所以在大众看来，这种马克思主义往往是令人敬而远之的。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书写方式往往是有着非普通大众的特定对象的，至少在西南边疆社会中针对普通大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写方式还有待进一步建构。

2. 马克思主义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大众社会生活需求的契合问题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面临两种不同的比较参照，却生成了同一种社会心理。以云南为例，相对于缅甸、老挝这些邻国，自身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优势，不断地坚定着他们继续搞好发展的信念；相对于较发达地区而言，自身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滞后，又不断激发着他们对于发展的强烈渴望。囿于发展观念的局限，现实中，人们又会把发展简单化为经济发展，把利益简单化为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于是，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中，经济发展、经济利益就成为一种普遍而强烈的社会需求。与此相孪生的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剥离，以及“工具理性”的单边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相对消弭。

由于书写方式的问题，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日常生活产生了疏离。马克思主义形象的这种异化，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访谈中，当被问及“‘马克思主义’在日常生活对您产生过哪些影响”时，我们经常听到诸如此类的回答：“‘马克思主义’是管党员和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是管当官的，好像不管怎么过日子吧”，“用‘马克思主义’怕是苦不来钱吧”（赚不来钱）。“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马克思主义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日常生活需求之间一定程度上

的“错位”，让马克思主义的供给和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需求之间的契合问题成为无法忽视的问题。而这种供给和需求间的契合却又是马克思主义认同产生的关键。

3. 认同博弈与“归属于谁”的现实困惑

为了解傈僳族、怒族等少数民族的信仰情况，笔者曾三次深入怒江流域，均是从六库出发一直到达西藏的察隅县。在怒江流域，最令人心醉是怒江的美景；感受最深的是现代性对怒江各族人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沧桑巨变。然而最令人揪心的却是少数民族村寨上空迎风飘扬的红旗（包括党旗和国旗）与挺立在峭壁上的十字架^[8]之间的博弈。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特别是我们党在边疆民族地区各项惠民工程的落实，怒江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认同建设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怒江地区各族人民普遍自发地会在自家屋顶竖起旗杆，悬挂党旗或者国旗，一时间红旗飘飘成为怒江流域蔚为壮观的风景。但我们也发现，怒江流域老百姓也较多地在屋顶上修建了十字架。社会转型期怒江流域的社会巨变，一方面激发起各族人民对于“我是谁”、“我们是谁”的强烈的自我追问，另一方面是各种宗教对大众的争夺。宗教同马克思主义对群众的争夺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的严重挑战。

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建设路径

把握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内涵与本质，剖析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的现状与成因，均是为了探索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建设路径。逻辑地讲，马克思主义认同建设，既包括马克思主义认同感从无到有的培育路径探索，也包括认同感达成后，如何保持认同感的持久和强烈的方法挖掘。本文着重讨论马克思主义认同感的培育路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同就是大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归属的认知、强烈的情感皈依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正向性行为。归属感既然是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核心要义，那么对于这种归属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在

一定程度上也就等同于对于自我归属于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支持者和拥护者这一身份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关于群体认同和身份认同的一些基础理论，应该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认同建设路径的探索提供一定借鉴。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族群内部”其实是包含着两类社会关系的，一类是从血缘、共同语言、宗教信仰和习俗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另一类是具有“个人魅力、战术需要、共同利益、道德义务”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格尔茨把第一类社会关系称之为“被给予”的社会关系。约翰·莱克斯通过对“人类在幼儿期都必须经历一种成为这类神圣群体的成员并获得满足感的体验”的现象的分析，提出了“族群和扩大的族群”的理论假设。他认为，族群并不是简单地“被给予”，而是在或多或少的思考下的制造，即制造一个集体去追求一项神圣的事业。^[9]回归现实生活，人的一生总会拥有林林总总的身份，归纳身份获得的来源，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生俱来的，生而就被抛于其间的“被给予”的身份，一种是人们后天基于对各类需求满足的追求所做的“选择”而获得的身份。除了极少数的身份外，人的大部分身份总是既具有“被给予”的因素，也具有“选择”的因素。一旦“被给予”因素和“选择”因素形成良性共振，则人们对该身份的认同感就会强烈而持久。所以，认同建设的理想状态是形成“被给予”因素和“选择”因素的共振，形成强烈的认同意识。

就“被给予”因素的培育而言，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认同建设有两方面工作刻不容缓。其一，马克思主义在场的社会氛围的营造。首先是要不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权威性的构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权威性符号的构建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科学性的宣传缺一不可。其次是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一基本国家特性的客观现实性的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家特性，具有这样特性的当代中国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保障。再次是要积极营造学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氛围。其二是加强中国近现代

史教育。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各族人民寻找、选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一切历史曾经都是当下，昨天的当下成为今天的历史和传统。应注重通过回顾历史，重拾各族人民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各族人民对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历史认同意识。马克思主义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选择，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昨天的历史造就了今天的现实，今天的抉择将造就明天的历史和传统。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对这份历史传统的维护和坚守是今天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一。

就“选择”因素的培育而言，有三方面工作亟待加强。其一，继续加大对西南边疆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关于经济持续增长的许诺一向是人们接受作为一个更强大的政治体内的一个少数群体这一地位的主要原因。”^[10]要继续加大对西南边疆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使其在对境外发展的比较优势中和对内比较差距不断缩小的现实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其二，继续加大对西南边疆民生事业的投入力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同胞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参与者，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享有者，持续的民生改善是增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大众切实的获得感的重要基础。其三，不断加大对马克思主义与西南边疆社会利益获得关联性的解读和宣传力度。一方面是回归马克思主义观照和解释现实的功能，这可以增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有用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与西南边疆社会发展和各族同胞利益获得之间的关联性的解读和宣传。西南边疆社会的巨大发展和各族人民各种利益的获得，不是和马克思主义无关的，而是由于我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是这种发展和利益的直接供给者。

我们不难发现，“被给予”因素的培育主要强调的是主体对归属感本身的认知和情感，这种路径产

生的是对认同客体的情感认同，其可能会激发出对认同客体的强烈情感，但如果长期缺乏现实的利益支撑，这种认同感往往会淡化、退化甚至消失。“选择”因素的培育主要是通过利益的供给而让认同主体获得满足感，进而产生认同，这种认同属于理性认同的范畴，然而这种认同充满了世俗性，一旦利益供给不能实现，甚至是利益供给无法满足期望，认同就会变得难以为继。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认同建设，不是要在“被给予”和“选择”两种路径之间进行选择和排序，而是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被给予”和“选择”两种因素的共振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不仅会更积极认同马克思主义，这种认同感也必然更强烈而持久。

参考文献：

- [1] 车文博. 弗洛伊德主义原理[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375.
- [2] 胡春阳.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历程研究[D]. 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 [3] Erik. H. Erikson,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1967, p.17.
- [4] [法]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译者：渠东.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2.
- [5][6] 张立波. 阅读、书写和历史意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多重表述[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9.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 [8] 曹月如. 挺立在峭壁上的十字架——傩傩族皈信基督教原因探析[J].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
- [9] 何群. 民族认同性与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成功调整[J].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
- [10] [荷兰]尼克·基尔斯拉特. 关于族群性的三种概念[J]. 世界民族，1996(4).

本栏责任编辑 朱国栋